时文美文

高三（下）第1期 总36期 主办：高三语文组 本期主编：赵雪 2017-2-13

===========================

**一、她仿佛唤醒了大众 诗词原来还那么美——深圳晶报**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普及了《诗经·七月》中的名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更火了一位16岁的诗词学霸武亦姝。2月7日，《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收官，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武亦姝历经三轮比拼，一路势如破竹，战胜另外5位实力同样超群的选手，最终夺冠。值得一提的是，高一的她在六位选手中年龄最小，仅16岁。

**登顶之路：自言“压力山大”却从容夺冠**

2月7日晚，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播出总决赛。参赛的六位选手均从此前的比赛中脱颖而出。自春节播出以来，《中国诗词大会》的关注度一直高企。随着武亦姝等人的走红，一场“古诗词热”悄然蔓延开来。古诗文教育顿成热门社会话题。

决赛第一环节为“个人追逐赛”。武亦姝第二位登场，答对全部9题，获得十场比赛以来的最高分——317分。这一成绩也让现场专家和主持人董卿连连惊叹。这一环节中，她击败的三位对手，也都是古诗词“高手”。

第二轮“飞花令”比赛，武亦姝的对手来自“百人团”中的获胜者——大学语文教师王子龙。

这一场飞花令的主题词是“酒”。也就是说，两人要轮流说出带“酒”字的诗句，直至对手无法继续。这考验的不仅是诗词储备量，还有临场快速反应能力。

这一轮比赛中，武亦姝与王子龙进行了八轮交锋，一口气说出了苏轼《水调歌头》、曹操《短歌行》、柳咏《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将进酒》、范仲淹《苏幕遮·怀旧》、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一）中的诗词。过招至第八轮，当被提醒所背诗句重复后，王子龙一时“哑火”，最终由武亦姝胜出。

最后一轮比赛是1VS1的擂主争霸赛。武亦姝挑战的是之前四夺擂主席位的守擂擂主彭敏。

赛制规定，擂主争霸赛共有9道题，两人抢答，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手加一分，率先积满5分者获胜。

“儿童疾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在这场由图片线索、文字线索题组成的比赛中，两人展开激烈角逐。这一轮比赛中，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彭敏因紧张出现错抢，年龄更小、自言“压力巨大”的武亦姝则表现得更为从容。

最终，武亦姝以5:3的比分战胜彭敏，成功夺冠。

总决赛现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说，武亦姝一直以来给人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但是恰恰是她，“不膨胀、不夸张、不招摇的小姑娘，诠释了一种以柔克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则评价她说，“不怎么笑，深沉地看着你，过一会徐徐地吐出一句诗来。”

**读诗时光：因为爱所以背**

有专家估算，武亦姝至少有2000首诗词储备量，不过，她并不是纯粹靠死记硬背的“诗词复读机”，在节目中尽显对古诗词的喜爱。武亦姝的老师黄荣华说，飞花令里她背诵的诗词，几乎都是复旦附中《中华古诗文阅读》校本教材中的必背内容，“但这届学生学完这本书（指《中华古诗文阅读》），能背出来的可能就她一个。”

“纯粹是因为喜欢而背”，武亦姝说，古诗词里有太多“现代人完全给不了的感觉”。她奉陆游为“男神”，宿舍书架上只有一本书，就是陆游的《放翁词》。

在诗句里，她能够感知陆游性情中可爱有趣的一面，觉得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温柔和深情，有时候也可以很明快、很清新。陆游一句“我与狸奴不出门”就能让她喜笑颜开，仿佛看到了那个天气不好就不出门，在家摸猫的陆游，赞叹“多么可爱的一个人！”

她也爱苏轼，感觉读东坡词能让人有好心情，苏轼可以根据人生境遇调整心态，不知不觉中，这种豁达的人生观也让她有勇气笑对各种挑战。

参加过两季《中国诗词大会》的评委蒙曼对武亦姝的印象是：宠辱不惊。而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特别胸有成竹，她评价：“去年的冠军是特别的气定神闲，武亦姝有点大勇若怯，她老觉得自己不行，她要赢了谁，她就会说：真的吗，真的是我吗？我觉得这个小孩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心，对什么都抱有一颗好奇心，对胜负看得没有那么重，没觉得自己很牛。”

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对武亦姝的比赛心态印象最深刻，“她很单纯，对诗词是一门心思让自己开心的那种喜欢，题目答对了当然好，错了也没关系。最后夺冠，她并没因为当冠军而感到多么激动和兴奋，如此稳重成熟的心态在这个年龄太少见了。”

在诗词大会成为网红后,武亦姝和家人商量，婉拒了所有采访，她表示：“我觉得比赛结果无所谓，只要我还喜欢诗词、只要我还能享受到，就够了。”节假日里，武亦姝的朋友在网上发了几幅她随手写的便笺，其中一句是道家《清静经》中的名句：“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诗词回归：唤醒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去年，央视推出《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时就好评如潮。去年是一周一期，今年在春节假期里密集上映，挂起一阵“诗词热”。

如今，购买版权几乎是电视综艺的唯一模式，因为承载了太多利益诉求，多数节目早已负担不起传承文化的使命。即时消费的娱乐综艺，最终几乎都走向同质化竞争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类节目却杀出重围，以内涵博出了收视率。

很多观众会以为《中国诗词大会》是一个新节目，事实上，这个节目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虽然《中国诗词大会》刚完成第二季的播放，但这个节目系列则可倒推至2013年首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这档节目获得成功后，央视在2014年再接再厉推出了《中国成语大会》。

吸收了前两档节目的宝贵经验后，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单从收视率而言，这三档节目都相当成功。不过它们最大的成功并非在收视率，而在于，这三档节目树立了一个新的风向标，唤醒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们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记者 马丹昊）

**二、将“诗词大会”当靶子只是自娱自乐 彭健——深圳晶报**

赵雷火了，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也火了，习惯了重口味综艺节目的观众，开始逐渐爱上有点不一样的小清新。毫不意外地，各种批评和质疑迫不及待地现身了——这几乎是这个不反转不足以吸睛、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足以出位的时代的标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诗词是小众的，为什么要普及？”“古诗词教育不是记忆力比拼”等等，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如此景象反复绽放，像极了一首讽刺诗。

在一篇名为《诗词肯定是小众化的，为什么要普及》的文章里，作者首先介绍了央视推出的这档商业化节目，进而大篇幅论证了古代诗词置于现代场景的小众化趋势。矛盾在于，既然明白《中国诗词大会》不过是一档商业电视节目，为什么要自说自话地往“普及”上扯？有红头文件强制收看还是有硬性考核和惩罚机制？这个问题回答不出来，就像建一座高楼，各种装饰材料都用得很漂亮，码砖砌墙也很努力，但回头一瞧——楼歪了。商业化节目的特点是尊重市场的选择，遥控器在自己手里，不喜欢可以换台啊，这不就“普及”不了，而且瞬间实现了“小众”的愿望么？

接着看“古诗词教育不是记忆力比拼”。《中国诗词大会》这种擂台赛式的节目形态突出的是记忆力，就像同样火爆的《一站到底》一样，考验的都是对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但节目就是节目，商业就是商业，谁说这是“古诗词教育了”？高兴的话，看一看听一听，学几句新的词句，挺好，不高兴的话，立马换台，不需要憋屈难过一肚子委屈地接受“教育”啊？

正如《中国好声音》火了没说是为了要普及流行音乐，《歌手》火了也没说是为了教育大家都提高唱功一样，自己立个靶子，然后拼命出拳，只能是自娱自乐。这样的玩儿法比较容易通过新奇和异质博出位，也比较容易在一瞬间赢得叫好声，但是当人们缓过神来，便会发现这些快餐式的东西经不起推敲。

作为一档商业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无疑是成功的，最起码有点文化，收视率还高。借由这样一种全新的、未必十全十美的节目形态让国人关注、谈论古诗词，也是功德一件。在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充满着焦虑迷茫的社会急遽转型期，人们太需要诗歌的安顿和抚慰——哪怕所采用的方式不那么完美，哪怕效果只是微乎其微，但总比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干要强。

在盛唐时期，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热衷于写诗、读诗、唱诗、听诗，那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是市井小民和青楼女子都要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的。这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味，就连发牢骚也发得漂亮潇洒：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某种意义上，诗歌是一个时代和国家盛大气象的象征之一，无论如何，让诗歌由隔膜变亲切的努力，都值得赞赏。

中国的古诗词文化博大精深，从入门到精通谈何容易。而即使是在古代，幼童在蒙学中也是先背诵，再理解，先把枣儿囫囵吞下去，再慢慢品咂滋味，先进入情境，再寻求精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死记硬背也并非毫无道理。当然，诗歌通向的是自由的灵魂，它通过艺术的形式和表达实现生命的升华与绽放，用最不寻常的文字探寻人性和人心的幽微之处，诗歌的目光，投向的是个体的自由与解放的彼岸。如果能让大家由陌生到热爱，如果能有更多的节目和方式让一个诗意盎然、诗意栖居的社会浮现，进而让更多的人从诗歌中体味到自由的真意，找到幸福的方法，该多好啊！

**三、激活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基因——**[**解放日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4-02/27/content_1145401.htm)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作出新的重要指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也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传统文化与当下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究竟有何关系？能否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

解放新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得到积极而又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是为什么？《意见》回应了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哪些期待？

叶小文：这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背景。当前，从国家层面看，中央重拳出击治理腐败，重塑官德，改善吏治，寻找破除权力寻租的良方；从日常生活层面看，老百姓对于“扶不扶老人”等事件不断热议，道德问题、底线问题常常引发人们的拷问。这两个层面的现象看似相关度不高，但实际背后都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深沉的文化焦虑，遇到价值观的两次大的绞力：**

**一是近代中国在几乎要亡国之际**，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惑和价值选择。面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面对工业化进程加快的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落后、破落到让人宰割的地步。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旧思的大讨论，实际是民族危亡之际的价值观痛悔和反思。当时，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抛弃旧文化；要民主、要自由，要以新文化来救中国。这其实是中华民族一次价值观的大危机、大冲击，是一种民族存亡绞力下的价值观大讨论。

**二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再次面对的价值观问题。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可是，由于我们进入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人类进步的但充满了矛盾的大场里面，价值观和文化层面又开始有绞力了。此背景下，我们要回答，物质丰富了，为什么有的人精神反而贫乏了？道德到底该怎么搞？人有没有底线？应不应该、能不能够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解决这些问题？

《意见》是对当前国家面对的价值观绞力的一个有力回应，它切中了人们对于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和困惑。从国家和民族复兴层面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这就是《意见》出台后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背景和深层原因。

解放新论：习近平总书记和《意见》都谈到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究竟能对核心价值观这个民族复兴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提供怎样的解答？

叶小文：《意见》出台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必要性”的热烈讨论和统一认识，进入到“可行性”的切实操作和走向落实的新阶段。

**价值观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要针对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构建我们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有积极性的一面，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但市场经济对价值观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力：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和道德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而这个悖论又很难在市场经济机制内部解决。

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有什么独特的解决办法吗？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是其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精神基因，使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

解放新论：但有人提出，传统文化无法为人们提供化解现代价值观困局的能力。今天，该怎么理解传统文化有其存在价值，特别是它在市场经济中运用的价值？

叶小文：先来看看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对市场经济的伦理对策。其中两个人的贡献最为显著：

**一个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的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的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但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

**另一个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于是现实生活中，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注脚。

但是，他们的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二是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呢？

所以，尽管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简单地就把我们带进现代化，但我们强调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不是要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使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交织，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新芽，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于传统文化不可能照搬，而需要重铸。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民族精神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解放新论：怎样重铸？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叶小文：这可以从回答三个问题开始：

**一是在人性和金钱的碰撞中如何激扬人性？**鉴于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二是在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中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如何避免市场经济全方位渗入社会生活更好地治理社会？**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总的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解决好市场经济伦理问题上“接地气”，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上“采金矿”。

关于“接地气”，《意见》明确要求，“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关于“采金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靠“神召”来作为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天下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等。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厚实和丰富。

**不只是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对精神支柱、精神安顿的问题。**其中，价值观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是东西方都遇到并且至今并未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在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能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可以尝试着，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成为君子，微观层面上的“扶不扶”、“骗不骗”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一应在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追求讲道德，尊道德，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积极推广传播中国文化。三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字，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用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四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艺术表演等各种方式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四、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国学大家**

■循序渐进，长期熏陶，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立德树人，简单说就是学做人，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人的素质，使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上、精神上一代代传下去。

■在国学传播中，除了教育体系外，来自社会的力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一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亚、西亚、南亚传播的情况，一方面研究外国人如何看待并研究中国的典籍。

近些年来，全国很多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学院，讲授国学知识，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11月27日，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在京成立，这所年轻的国学院因着眼于“传播”这个独特新颖的方向而得到学者们的好评。

国学传播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大课题，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仅有贸易，还有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学传播更值得研究，因为国人的传统文化素养仍有流逝的危机。通过传播、阅读和深入研究，才能使传统文化“活”起来，融入文化发展之中，使生活在当代的人们和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共同分享，启迪心智、提高文化素养、增强创造力。记者走访了几位著名学者，在采访中，他们分享了自己传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感受与思考。

**刘梦溪:“六经”价值亟待传播**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弘扬国学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比如他写作的《论国学》。在他看来，国学首先是学问根底问题。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学，一个是小学。经学就是“六经”，“乐经”虽然不传，习惯上，直到清末、民国，师儒级学者仍以“六经”称之。而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通经的工具和路径。

“我最服膺马一浮先生给国学下的定义，他认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马先生称之为‘六艺’。‘六经’是中国学术的最初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其精神义理价值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做人的基本依据。‘百家’、‘四部’均为‘六经’的流裔，为‘六经’所统摄，而不能凌替‘六经’。”刘梦溪先生说，“在这一定义下的国学，可以成为文史哲诸学科之外的一个单独学科。国学院内部的设置，则应包括经学部、小学部、国学教育部(或国学传播部)三个部类。”

刘梦溪先生认为，中国学术的本原，悉在“六经”，“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而现在，“六经”的价值伦理亟待传播，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也亟须薪传。认同“六经”为国学的主要内涵，国学就可以进入国民教育。“‘六经’不好读，可以从《论语》、《孟子》入手。‘六经’的文本经过孔子删定，孔子、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我梳理出敬、诚、信等价值理念，是为‘六经’的基本精神义理。而且认为‘敬’作为终极价值，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应开设国学课，循序渐进，长期熏陶，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钱逊:积极探索，但核心不能丢**

今年，中华书局引进台湾地区高中必选课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2013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后，教材开始在数所中学使用。该书的牵线人正是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先生，他向中华书局推荐了这套在台湾积累了几十年经验的传统文化教材。

“传播国学，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必须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从传统文化本身出发，必须与社会实际，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钱逊先生对此有忧虑，他认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开创民族文化新的辉煌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们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以走，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没有现成可以依循的成熟经验。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多种形式，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找到合适的道路。“就拿教材来说，选材、数量、注释、体例等，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学术思想和学生状况，都需要研究。就拿这套台湾教材来说，已经在一些学校使用，但并不意味着就确定用这套教材了。而应该认识到，这个教材在台湾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修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钱逊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我有一次在培训中问一个小学老师怎么读论语，结果他连找论语的什么版本读都不知道，只是经常看一些五花八门的解析。”钱逊先生说，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有很多人对国学的认识就是背古文、背诗词，或者是武术、京剧、书法等。对此，他指出，这就是没有抓住传统文化的核心。诗词、京剧、书法等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抓住传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这个核心内容，立德树人，简单说就是学做人，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人的素质，使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上、精神上一代代传下去。

**牟钟鉴: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我原来是书斋里潜心研究的学者，通过书院的活动，能够为国学传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社会大众普及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今年刚刚卸下了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的职务，但“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家的事业”这一行为准则，他还会继续践行下去。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承载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功能，支撑了唐宋以来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又为培植民风、纯化民俗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晚清废除书院100余年后，适应当代文化发展的需要，上千家书院在全国各地又以新的面貌和方式重新涌现出来，并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国学研究和推广活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牟钟鉴先生认为，在国学传播中，除了教育体系外，来自社会的力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其中，书院已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力量。一方面，书院在学术研究上具有较高水平。“在尼山书院，我们探讨儒学在现代条件下的返本开新之路，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通过恢复“会讲”这种古代书院充满自由探讨精神的讲学方式，让师生们在这里讲习问难，教学相长，使得传道、授业、解惑的儒家教学传统得以重新接续。”另一方面，书院从社会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国学传播，使传统文化在社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尼山书院的文化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和学校，并且辐射到社会各个阶层，与很多机构合作开展国学培训，还开办了乡村儒学大讲堂，免费为周围乡村的乡亲们传授儒学知识，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牟钟鉴先生介绍，通过书院这一载体，学者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在尼山书院，几乎所有学者在这里开展的讲学活动都是免费的，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义工。他认为，学者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能够保证国学传播的学术水平。举例来说，尼山书院到乡村去开展讲座的都是高校、社科院等单位的知名学者；其次，学者可以通过其学术积累产生辐射作用。同样举个例子，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在尼山书院为美国的大学老师和学生用英语讲授四书，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的国际人才，成为‘儒家使者’。”

**傅璇琮:国学对外传播值得研究**

“按我的理解，国学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传统文化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持续时间最长，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另一个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外的交流时间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泛。“20世纪初，我们的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曾经写道，我们以后如要发扬、光大我国的学说，一定要兼通世界学说。在20世纪初的环境，王国维先生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国学的对外传播和交流非常重要。”

作为研究唐宋文学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以唐宋文学为例，说明了研究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必要性。“日本在中国唐代时是没有文字的，唐诗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习唐诗的人非常多，有很多人甚至能用中国的文字，照唐诗的体式来写诗。在盛唐和中唐时期，日本已经编了三部诗选——日本人用中国文字写的中国古体诗。其中有两部书的前言，讲到了他们如何研究和创作诗歌，并引用了唐太宗某篇文章的话。另外，古代的朝鲜，在我国宋代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用中国文字写出的诗话，国内有学者正在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由此可知，在唐宋时期，我国的诗歌和文学理论对周边的日本、韩国影响很大。这值得我们揣摩、研究和重视。”

据傅璇琮先生介绍，在唐宋时期，朝鲜、日本人来到中国，除了当学生，还大量采买中国的书籍，带回本国，现在日本就藏有很多在中国很少见的书。这就产生了两个影响:其一，中国书传到朝鲜、日本，影响他们；其二，这些书的保存，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人。“我们应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课题，一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亚、西亚、南亚传播的情况，一方面研究外国人如何看待并研究中国的典籍。我想从国学传播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方向。”傅璇琮先生说。

**五、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找回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

在传统文化里。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中华“文化传统”能薪火相传，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改革开放尚未到位的转型期满足着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用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党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圣经中Calling)，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

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就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当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不要轻看了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六、激活传统文化经典推进现代社会文明 ——“于丹热”温润了人们饥渴的心灵   关绍羽**

从先秦诸子百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到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程颢、程頣、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经历代杰出思想家的传承和弘扬，扬弃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造就了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相融合的博大精深、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断裂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负效应，但是仍有牟宗三、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杜维明等一批学者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做出不懈努力。  
  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在众多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为何于丹一鸣惊人、一举成名，以至引发了一些人的“红眼病”？是她女性的风采和魅力吗？是她同“百家讲坛”的特殊关系吗？是她在中华传统文化造诣上的权威性吗？是媒体的故意炒作吗？……这些推测和非议都不能给人以信服的答案。那么，在为什么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怎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于丹心得”又给了我们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必须与时俱进，融于现实生活，推进现代文明**  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把古圣先贤的经典作为学术问题单纯地进行理论研究，也不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弊端的困惑去追朔古代文明而主张简单地复古，而是为了汲取古圣先贤的智慧去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推进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因为历代圣贤能够正确处理传承与弘扬、扬弃与创新的关系，运用古圣先贤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去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孟子也不会被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齐名而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朱熹也不会集儒学之大成创立“程朱理学”而开创儒学昌盛之先河，王阳明也不会创立“陆王心学”而为后世所推崇。正如于丹所说：

（二）**必须立足现时，破解心灵困惑，提升精神境界**  古圣先贤的经典之所以穿越千古沧桑流传至今仍然被人们所尊崇和喜爱，就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生活体验中总结出的朴素道理，能够破解人们心灵的困惑，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正如于丹所说：  
  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于丹〈论语〉心得》第117页）  
  **（三）必须面向大众，温润人们心智，振奋民族精神**  古圣先贤的经典，并不是专门留给后世学者作为理论研究的理论专著，而是他们从自身体验中总结出的面向大众的朴素的真理，因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熔铸在每个华夏子孙的根脉中。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的三千弟子并不都是出自于达官显贵。《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整理出的孔子与学生谈话的记录，是孔子从生活体验中总结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庄子》更是以寓言故事喻示了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欢快中受到心灵的陶冶。正如于丹所说： 这个世界上的简单真理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从不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灌输，而是对于每个心灵内在的唤醒。（《于丹〈论语〉心得》后记第2页）

**七、用精神激活传统文化**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国家图书馆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http://renwuku.news.ifeng.com/index/detail/5/xijinping)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考察了传统文化典籍保护和普及工作，参观了近年来出版的优秀图书和出版走出去精品展，了解了数字阅读情况，并与专家学者进行深入交流。

刘奇葆指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要注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取向应该是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的文化，并体现到方方面面。在文艺创作中要着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在学校教育中要着力用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在城市和乡村建设中要着力延续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真正把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开来。

刘奇葆强调，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选取出来进行准确通俗的解读，对于推动传统文化普及传播很有必要。

刘奇葆指出，**阅读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要在全社会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引导人们爱读书、读好书。出版单位要为人民群众送去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八、如何激活**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之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无数灾难和战乱而不衰不屈的强大力量。   
　　然而，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瀚如海、如空气和水般重要，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大量涵养人们道德情操、提升人们精气神的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蒙上了历史的尘土，甚至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渐渐消逝。那么，如何才能够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其更具时代内涵、散发出时代精神的光芒呢？笔者认为，关键要抓好“三个一批”。   
　　要出版一批精品图书。我们的先辈在长期的劳动和实践中，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后人们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都用书籍予以记载流传。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优秀的书籍并未进行重新整理、编撰和出版发行，一些传统文化也无法得到很好地传承与弘扬。因此，要想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就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精心编纂和出版一批有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强的精品图书，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要打造一批经典剧目。优秀的文艺剧目不仅能够感染人、打动人，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智取威虎山》《江姐》等一些红色经典剧目，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因此，要在保留原剧主题思想不变的基础上，重新对经典剧目进行深挖、编排。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融入时代元素，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经典剧目，帮助人们更好领略传统文化经典的魅力。   
　　要保护一批文化遗迹。历史遗迹是我们祖先劳动、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然而，由于资金、人员、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各地要积极深入开展文物遗迹普查工作，并按照轻重缓急的要求，对一批民间的重点历史文化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着力延续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使其能够承载更多、更加浓厚的乡愁。   
　　总的来说，激活传统文化要抓好“三个一批”。只有找对路子、抓好重点，才能够真正激活沉睡的传统文化，把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开来。（黄鹤）

九、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

　　　25岁“进宫”，一入宫门三十余年，调侃自己是台北故宫的一名“宫女”。已退休的周功鑫视野很开放，她的传统文化普及实践，除了做书，还包括在线游戏式学习、动漫、电影等探索，她关注博物馆世界范围内的趋势，她说，把艺术和文化和游戏结合在一起，全世界都在找这个做法，**“我希望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回到纸面的世界，而是能和当时的科技进行各种结合，进入各种媒介，甚至进到生活里面。”**